

### 第三节 天主教活动

天主教的教规、教条森严,信徒一定要崇拜天主(上帝),要尊玛利亚为“圣母”,要遵守“十诫”“四规”。教内有“领洗”、“坚振”、“告解”、“圣体”、“终付”、“神品”、“婚配”,名曰“七圣事”。教堂每日有早课经,下午念玫瑰经,星期日念弥撒经。一年中有四个大占礼(节日):耶稣复活占礼、圣神降临占礼、耶稣圣诞占礼和圣母升天占礼,届时教徒都要前往教堂参加做大礼拜活动。同时还严禁神父、修士、修女娶嫁,信教的要领洗,领洗的叫教徒,没有领洗的叫“保守”。

#### 天主教爱国会

团结教职人员和教徒,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反对境外敌对势力干涉教会事务。在教会内部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提高教职人员和教徒的政治思想觉悟,教职人员和教徒明确爱国爱教是每个公民的应尽义务;理解只有爱国才能真正爱教;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宗教团体合法权益。

教会按照中国天主教“三个规章制度”,积极推进民主办教过程,逐步形成教会在重大事宜上集体领导、民主管理、相互协商、共同决策的良好机制。每天有序地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并发展了浮梁县小沅村的宗教活动场所。

## 第四章 基督教

### 第一节 基督教源流

景德镇的基督教是指公元16世纪以后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新教”。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华基督教内地会传入景德镇,由英籍传教士祝康宁主持建造耶稣堂。1913年中华美以美会派王善治牧师在景德镇布道并置地建造福音堂。1917年圣公会传入景德镇,1927年在公馆岭建造圣公会教堂。1938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传入景德镇,但为时不长。上述教派组织均由外籍牧师和华人传教士来景德镇租房设布道点,讲经布道,发展信徒,培养传教人员,然后兴建教堂(或设分堂),以办学校,免费学英语,搞慈善活动等方式扩大影响。从城区到农村,先在城市贫民阶层手工业者、工人、农民、小商贩中传教发展信徒,进而到西医、教职员知识分子和工商业主中发展信徒。教牧人员大多由总会或教区派遣,内地会由总会派外籍牧师来主持教会,中国传教士协助,圣公会由总会或牧

区派中文、外文会长来主持教务。教会所需经费均由英国、美国差会拨给,抗日战争后,经费来源减少,少量由信徒捐赠。教会设立执事会,负责教会各项活动开展,圣公会还设立校董会和司库,管理教会和教会学校的财物。抗日战争前后,是景德镇基督教较盛时期,有耶稣堂、福音堂、圣公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宗教活动场所,信教人员渐增,全景德镇约有1000人。三个教会组织订立爱国祈祷日(每周五),联合进行礼拜,组织难民和贫困教徒生产自救,发动社会募捐奉献等慈善活动。

1949年4月,景德镇解放后,各教派基本维持现状,仍属差会管辖,外籍传教士陆续回国,均由中国牧师主持教务,并分别成立“三自”爱国小组。1958年成立市基督教“三自”运动委员会,推选张秉炎为主任委员,同时被推选为市政协委员,继后历届市政协中均有基督教代表为常委或委员。教会开始沿着“爱国爱教”、“自治、自养、自传”的方向发展,市基督教三个教派组织联合礼拜,教徒统一在市福音堂进行宗教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政策受到践踏,宗教活动停止,教堂及所属房屋被占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得到贯彻落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市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逐步退还被占用的教堂和房产,开始恢复礼拜。教徒增到2234人,同时,恢复成立景德镇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 第二节 教派组织

### 内地会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内地会上海差会派遣美国人爱传教士(女)带领布道团进入景德镇传播福音,并买下城区前街珠弄口一染布坊(今中山南路88号)作为布道点。1901年派遣英籍传教士祝康宁和华人牧师王则久(又名王永年,余干人)来景德镇地区开展传教事业,并由英国差会拨款在染布坊地基上兴建教堂,由王则久具体经办,落成后名叫耶稣堂。王牧师在耶稣堂传教18年,以后差会派吴仪光牧师(都昌人)来景主持教务。1934年差会派遣美国人饶宝慈牧师来景传教并主持教务,同时来了一位中国教士汪永泉(鄱阳人),一年后饶牧师调回,汪教士调婺源教会。1935年差会派英国人毕尔德牧师夫妇来景德镇教会主持教务。1936年教会派潘先生(余干人)夫妇坐堂布道。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差会撤离上海,毕尔德夫妇回国,景德镇内地会实行自养,成立执事会,管理教会事务。选出执事7人,即:江茂孔、于老先生、姚发姣、傅师母、王三一,执事会由王三一负责。

抗战期间,来景德镇传道人员还有殷修德牧师(星子人)、陆希娥牧师(都昌人)、沈炳荣、潘先生、周迁标、江茂孔等。

1943年,王三一召集许芝彩、马仁邦、熊从灵、罗正国、周迁标、江保罗等7人组成奉献布道团,前往鄱阳田坂街、谢家滩等地布道。